

施政設關鍵績效指標 應與市民幸福感掛鈎



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20日主持召開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，決定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，於2022年7月1日就職。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的競選政綱提出三大施政方向，包括以結果為目標解決不同的問題；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；奠定香港發展的穩

固基石。三個施政方向反映了李家超務實沉穩的施政作風，亦顯示他準確地為香港現況把脈，明白市民最想見到施政有成效、經濟民生有改善、香港競爭力明顯提升，落實「以結果為目標」的施政理念，增強市民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。

麥美娟 工聯會副會長 立法會議員

為達到「以結果為目標」解決問題的效果，李家超表示，上任後會為特定工作訂立關鍵績效指標(KPI)。關鍵績效指標，是用來衡量一項工作的成效，也能為團隊或公司訂立明確的工作目標。國家亦會用KPI來訂立工作指標，例如「十四五」規劃為推動科技及先進製造業發展訂立了目標，包括訂明2021-2025年間預期每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增長7%，2025年預期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10%，基礎研究經費投入佔研發經費投入比重提高到8%以上等。

內地扶貧考慮衣食住行

不過，施政的KPI單單是數字並不足夠，還要照顧市民的实际需要。內地推動脫貧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。2012年內地發起「脫貧攻堅

戰」，設定貧困線標準為每人每年2,300元人民幣；此後經過多次調整，至2020年時，脫貧戶每年純收入要達到4,000元人民幣。但脫貧線4,000元純收入不是唯一的目標，國家明確指出，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「兩不愁、三保障」，即是不愁吃、不愁穿，保障他們義務教育、基本醫療、住房。內地脫貧不是以數字為本，而是以人為本，內地脫貧是一個綜合性的工程，考慮到人民實際生活的需要，吃、穿、教育、醫療和住房樣樣顧及。

反觀香港訂的施政指標，往往只有數字。以臨時過渡性房屋為例，去年施政報告提出將臨時過渡性房屋加碼至二萬個單位。二萬個單位只是一個興建房屋的數字，沒有顧及市民的工作、教育等實際需要。

臨時過渡性房屋是為了安置劏房戶，讓他們不

用再住得貴、住得差，但很多時候，劏房戶寧願節衣縮食、捱貴租，忍受惡劣的環境，選擇住在市區劏房。原因是香港基層勞工人工低、車費貴，劏房戶只有住在鄰近工作崗位的市區，才能節省車費；由於劏房戶不願見到下一代再捱窮，對子女教育期望很高，因此希望子女能夠在區區聲譽良好的學校上學，也可以參與區內各樣課餘學習，因此寧願居住在市區的劏房。

增加臨屋要做好配套

按政府公布的臨時過渡性房屋興建地點，不少在偏遠地區，例如元朗牛潭尾、同心村、八鄉江夏圍、大埔船灣黃魚灘，興建完成後，劏房戶會選擇入住嗎？劏房戶要考慮能否負擔一家人上班、上學的高昂車費，父母要考慮子女的讀書問題、考慮有沒有社區支援，包括家

人、朋友以及非政府組織等。

如果偏遠的臨時過渡性房屋建好，卻吸引不到劏房戶入住，那既改善不了劏房戶的居住環境，也浪費了政府的資源，得益的可能只是提供土地的地產商，政府做好三通一平（即通水、通電、通路、土地平整），為發展商發展相鄰的土地奠定基石。而且，偏遠地區的臨時過渡性房屋，無助增加市區房屋供應，不能壓低市區劏房租金。

筆者認同李家超「以結果為目標」的施政理念，認同在特定工作訂立KPI，但在制訂KPI時，應借鏡內地脫貧標準的綜合指標，一定要顧及工作、教育、醫療、社區支援等實際需要，市民才會感到政府施政真心照顧他們，才會有幸福感。關鍵績效指標不是「跑夠數」就可以，而要與市民的幸福掛鈎。

美國利用IPEF孤立中國是癡人說夢

宋忠平 時事評論員

拜登亞洲行重點之一，是推銷IPEF(印太經濟框架)。在拜登政府眼裏，IPEF更加符合美國的全球利益，更可以有效抗衡中國影響力。IPEF本質就是「印太戰略」在經濟領域的延伸，旨在補齊「印太戰略」缺乏經濟支撐的短板。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就曾明確表示，IPEF包括協調出口管制，以限制向中國出口「敏感產品」。美國貿易代表戴琦更是公開宣稱，這個框架就是「獨立於中國的安排」，對中國的排他及針對性可見一斑。

拉攏盟友圍繞開WTO重新洗牌

IPEF包括四大板塊：一是公平和有彈性貿易；二是供應鏈彈性；三是清潔能源、脫碳和基礎設施建設；四是稅收和反腐敗。不得不說，這四大板塊無不是瞄準了中國，其根本目的就是在新經濟等高科技領域構築一個封閉、對抗性的供應鏈體系，以尋求中國以外的供應鏈替代方。

不同於傳統的自貿協定，IPEF是商議經濟議題的平台，重在制定一系列貿易規則，更像是繞開WTO重新洗牌的美版WTO，由囊括不同議題的多個貿易規則模塊組成，參與國無需加入所有模塊，但必須同意所加入模塊的所有條件，而這些模塊設定條件都是由美國人擬定並頒布實施，也就是美版的WTO遊戲規則全部由美國人親自制訂，「美國優先」必然是其中的硬核。由此，在IPEF機制上，拜登政府傾向於更多採用磋商等非正式的執行機制，而繞開被廣泛使用的類似WTO的爭端解決機制。

為了拉攏盟友紛紛加入IPEF，美國為IPEF貼上的標籤是「適應21世紀要求的多邊夥伴關係」。但這些所謂的「夥伴」都是有嚴格限定的，即是否「支持美國價值觀和規則」，其本質就是要搞反華的「小圈子」、搞封閉排他「俱樂部」。如今，在拜登政府的鼓譟和力邀下，日本、韓國、澳洲、新西蘭、菲律賓、泰國等國將成首批成員，但印尼、印度等國則對參與IPEF持保留

意見。

美不願提供「市場准入」為硬傷

針對美國一手打造的IPEF，韓國總統尹錫悅辦公室將IPEF形容為「供應鏈同盟」，IPEF追求的是建立合作的平台與機制，希望外界不要反應過度，並強調即使韓國加入IPEF，未來仍會與中國進一步擴大經濟合作，「絕不是想疏遠中國」。但這或許只是韓國的單純想法，美國不希望產業鏈，尤其是高科技產業鏈與中國有任何瓜葛，美國要的就是產業鏈「去中國化」。

毫無疑問，IPEF是披着經濟外衣的政治架構，也是以此展現美國落實「印太戰略」的堅定決心。但IPEF不可避免面臨不少挑戰，其核心難題在於美國難以為相關國家提供「市場准入」的現實利益，只希望單純利用貿易規則撬開其他國家市場。比如，日本希望向美國提供更多機電產品，東南亞、南亞的發展中國家期待向美國出口農產品、製造業產品等，而這些產品勢必會讓美國人視為傾銷，有損美國國內的就業和製造業。因此，由於拜登政府不願在「市場准入」問題上為印太地區國家提供更多實際利益，IPEF也就無法替代CPTPP。但與此同時，拜登政府試圖在IPEF框架下制定包括人工智能及5G等新興技術方面的框架和標準，以美國的高科技產品堂而皇之輕鬆佔領其他盟國市場，而不是通過市場競爭機制奪得市場，這必然也會降低其他國家科技企業的全球競爭力。

面對IPEF帶來的巨大衝擊和挑戰，中國要做到戰略上藐視、戰術上重視。戰略藐視是指，中國龐大國內市場、「一帶一路」倡議成果和已經完備的產業鏈不是一朝一夕能被取代的，中國要保持戰略定力。戰術上重視是指，中國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力度，強化市場准入機制，善用現有的RCEP等國際經貿協定不斷增強中國自身的經濟競爭力和吸引力，這樣才能有效應對美國不斷發難帶來的大國地緣博弈。

柯創盛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共同發起人 觀塘區議會主席 香港群策匯思主席

東鐵線過海段於5月15日正式通車，並新增設會展站，對本港鐵路網絡進一步完善有正面作用。近年屯馬線等多條鐵路線通車，網絡逐步完善，然而鐵路工程常出現延誤問題，加上工程費用時有超支情況，在時間上、金錢上、發展上，以至公眾觀感上均構成不良影響。

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政綱中提出「基建先行，創發展容量」的想法，並具體表示將「審視和推進已公布的重要鐵路項目，利民便民」。筆者期望新一屆政府能優先審視和推動在2014年已提出的「東九龍線」；另外其他鐵路項目，例如處於「北部都會區」的北環線和洪水橋站，還有屯門延線、東涌延線及科學園附近的白石角站，亦希望新一屆政府能拆牆鬆綁，加快興建速度，始終越早有鐵路通達，越有利房屋及早到位，這樣才可為本港交通完善及長遠發展帶來新氣象、新希望。

新一屆政府在審視和推進發展鐵路網時，必須糾正存在已久的問題。香港鐵路運輸專業人員協會早前比較了深圳、新加坡和香港三地的鐵路發展情況，其中有幾點分析值得政府留意：(一)香港發展鐵路一般比深圳及新加坡慢3至4年；(二)香港發展鐵路需政府及港鐵反覆研究、設計、評估及審批；(三)深圳先

完成規劃和研究才公布項目，隨即設計及施工；(四)新加坡則把鐵路規劃、設計及興建交由陸路交通局集中負責。故此筆者建議，政府要成立專責部門處理鐵路發展事宜，加強監督，引入更好的競爭模式，加大發展引擎；精簡行政及項目推進程序，加快施工，避免再出現延誤及超支等情況；打破舊思維，摒棄要有足夠人口才興建鐵路的保守觀念，也不應再以「客量低浪費資源」等理由決定鐵路發展；確立新觀念，視鐵路網絡為本港長遠發展動力，以至與國家發展大局接軌的重要基建，以鐵路作新發展區的超前規劃工具，建新路線要以配合城市發展為前提，不應只着眼於短期利益及小局發展。

特區政府要打破舊思維、確立新觀念，有序促成良政善治，尤其鐵路發展之重要程度與日俱增，未來「北部都會區」及「明日大嶼」交通網絡關乎本港長遠發展，當中必須做到基建先行。香港不能再被工程延誤、工程超支等問題引發或形成交通方面的深層次矛盾，這不僅對香港本地發展、與內地接軌等構成負面影響，也對爭取市民支持、爭取民心回歸形成障礙。



政府須用新思維發展鐵路網

梁熙 立法會議員

最近有消息指，當局計劃封鎖Telegram即時通訊軟件，以打擊日益嚴重的網絡欺凌現象。消息自傳出後，除了有個別人將當局舉措抹黑為「打壓言論自由」外，Telegram平台更在一日內湧現過千條的「起底」信息，儼然向官方作出挑戰。

筆者絕對支持特區政府封鎖Telegram，希望當局不要只停留在研究階段，而要以具體的方式作出有效的管制。事實上，有關即時通訊軟件的問題確實是罄竹難書。除了筆者之外，不少高官、知名人士，甚至前線的執法人員均深受其害。過去更有案例，有入境處的文書助理利用職務之便，將官員、法官、警員及其家屬等215人的個人資料放在有關的軟件群組之中，當中更不乏一些敏感的隱私，例如身份證號碼、居住地址、手提電話號碼等。這導致了他們被人瘋狂滋擾，地址被人「代叫外賣」，甚至擔心自己的身份證號碼被利用作不法用途。除了「起底」外，有關的軟件更被揭發有煽動刺警仇警、教授自製汽油彈等不法行為。

由於有關的軟件在創立之初，已經被標榜為高私隱度，隱匿性較同類型軟件為高，故深受海外極端分子、反政府人士的喜愛。自軟件傳入香港後，黑暴分子便利用其作為組織活動的平台。縱使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近月多番要求Telegram刪除「起底」

信息，可是未獲積極回應，相關的行為一直被縱容。

由於Telegram在香港沒有辦事處，而且平台的伺服器更遠在海外，以致特區政府難以直接規管有關的公司及其負責人。直接地說，就是超出了執法範圍。雖然，這迴避了當局的執法，不過當局仍必須清楚向社會表達，誰才是香港的主人，不能讓境外的公司和別有用心人士在香港予取予求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網絡公司不能依仗其海外身份，縱容違法行為。

當局可以從本地互聯網供應商著手，限制用戶連接有關的程式，達到封殺的目標。現時用戶必須透過本地互聯網供應商的系統連接海外，而本地互聯網供應商的牌照及行為，又受到特區政府的監管。因此，縱使政府不能直接規管Telegram母公司，也可以透過規管本地互聯網供應商，間接達到規管的目標。

對於言論自由，社會固然無比尊重，但當有關的言論損害了他人的利益，甚至是鼓動他人從事不法行為的時候，相信沒有哪一個地方可以容許存在。因此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，就算是美國政府面對同一個問題，反應也應該與特區政府相若。



嚴正處罰縱容不法活動的通訊軟件

改革地區行政 提高施政效能

丁江浩 民建聯培訓委員會副主席 教聯會理事 清遠市政協委員



事事關心

特區政府決定重組架構，採用「三司十五局」方案，並增設3名副司長，初步獲得立法會多數議員表態支持，預料順利通過的機會相當大。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，重組政府架構有助釐清部門職能，定位清晰、名副其實，使新一屆政府可以聚焦民生、改善經濟，讓香港重新起飛。隨後有評論指出，優化地區治理架構，革新地區行政，亦是未來特區政府不能忽略的工作重點。

新方案貫徹李家超「以結果為目標」的施政理念，令廣大市民對特區政府施政有一定期望。李家超在當選後主動會見本地政黨代表，例如民建聯、新民黨和經民聯等，放下身段、態度謙卑，願意聆聽不同政黨人士的意見。李家超強調所有司局長上任後必須與立法會議員保持良好溝通，從而改善政府施政，在提醒政府官員作出決策前必須走出「冷氣房」，多接觸基層市民、聆聽民意代表聲音，以達至良政善治的目標。

新一屆特區政府在架構改組後，需要在短時間內交出一份亮麗成績表，以贏取市民信任。筆者認為特區政府官員應多落區與市民溝通互動，切實為市民解決長期想解決但一直未解決的地區「老大難」問題，為地區為市民做實事好事，相信對提升特區政府民望產生即時效果。

根據香港基本法，特區政府可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，接受特區政府有關地區管理和其他事務的諮詢，或負責提供文化、康樂、環境衛生等服務。以往18區

區議會扮演上述角色，並發揮作為政府與市民溝通的橋樑作用。時至今日，區議會經歷設立宣誓制度，在反中亂港政客大規模辭職下，兩年多以來，多區區議會只剩寥寥可數的區議員，連正式開大會也有困難。與其無了期讓區議會空轉下去，不如早日作出一個重組或革新地區行政方案，特區政府需要好好考慮。

回顧過去，18區區議會曾經發揮重要作用。特區政府除了可以通過區議會收集社情民意之外，很多地區事務由區議會負責處理，多年來運作暢順。這次第五波新冠疫情爆發，政府動員大量地區團體人士包裝和分發抗疫物資包，例如不同民政處分區委員會、減罪會和防火會等，不分晝夜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門，發揮地區組織力量，成功阻擊疫情擴散。事實證明，地區性組織應對突發社會大型災害或疫情有相當成效，同時說明區議會、分區委員會等一系列區域性組織有存在價值，如何再加以整合統籌，是十分有意義的探討。

既然由區域組織組成的地方行政有一定重要性和角色，區議會存廢必須要盡早處理。李家超表示，經過第五波疫情抗疫工作，會考慮設立18區地區服務及關愛隊伍，繼續做地區工作。如何整合地區組織，保留區議會或組成新的地區行政架構，也是特區政府需要提上日程的一項工作。不管如何，擔任過多年區議員的筆者期望新一屆政府上任後展現施政擔當，早日公布改革新方案，為地區行政帶來新變化。